



社會主義與宗教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列 寧
社 會 主 義 與 宗 教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聯 書 店

出版者說明

本書曾由「天下出版社」出版，此次重印時，將第二篇論文改用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的譯文；其餘兩篇對照原文校訂了一次。

郁文 譯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單布胡同10號

•

1954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54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31¹/₂×43¹/₂1/32·21,000字·總號1057·分號Q607

1—20,000冊·定價1.100元

•

• 發行者 •

新 華 書 店

目次

社會主義與宗教·····	一
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八
各階級和各政黨對於宗教和教會的態度·····	二五

社會主義與宗教

現代社會完全建築在地主資本家階級的極少數人對工人階級廣大羣衆的剝削上面。

這種社會是奴隸所有者的社會，因為一生爲資本家工作的「自由」工人只對這樣的生活資料「有權」，這種生活資料是養活那產生利潤的奴隸所必要的，是保證和延續資本主義奴役制度所必要的。

對工人的經濟的壓迫必然會引起和產生對大衆的各種政治的壓迫、社會地位的貶落、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折磨和蒙蔽。工人能够努力獲得或多或少的政治自由，以爭取自己的經濟解放，但在資本政權未被推翻的時候，任何自由都不會使他們解脫貧困、失業和壓迫。宗教是各種精神壓迫中的一種，這種精神壓迫在被永遠爲別人工作、窮困和孤獨所壓潰的人民大衆當中是到處存在着的。被剝削階級在跟剝削者鬥爭時的軟弱無力，必然會產生對優美的來世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蠻人在跟大自然鬥爭時的軟弱無力會產生

對上帝、魔鬼、奇蹟等的信仰一樣。宗教對一生工作和一生貧困的人，用現世生活中的順從和忍耐來教訓他，同時用期待天國的報償來安慰他。而對依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的人，宗教就用現世生活中的行善來教訓他，同時非常便宜地寬宥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廉價地賣給他們以享受天國幸福的門券。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宗教是一種精神上的濁酒；資本的奴隸由於這種濁酒的麻醉，將自己的人的形骸，將自己爲人所應有的一點兒樂生的要求都忘去了。

但自覺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和起來爲自己解放而鬥爭的奴隸已經有半個身體不再是奴隸了。現代的覺悟工人，是由巨大的工廠工業教養出來的，由城市的生活所啓發的，他們正在輕蔑地拋棄宗教的偏見，讓僧侶和資產階級僞善者去處理天國，而爲自己爭取地上的優美生活。現代的無產階級正站到社會主義的一方面來；社會主義引用科學去和宗教的迷霧作鬥爭，並團結工人爲優美的現世生活作真正的鬥爭，使他們擺脫對來世生活的信仰。

宗教應當被宣佈爲私人事情——這句話通常是用來表示社會主義者對宗教的態度。但這一句話的意義必須予以正確的規定，使它不致引起任何誤解。我們要求宗教對

國家而言是一件私人事情，但我們怎麼也不能認爲宗教對我們自己的黨而言是一件私人事情。國家不應當跟宗教發生關係，宗教團體不應當和政權聯系起來。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承認任何宗教，亦即做一個無神論者，正如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通常都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公民間，完全不允許因宗教信仰而有權利方面的任何差異。在正式的文件裏，也應當無條件地取消關於公民的某種信仰的任何記載。既不應當對國家教會有任何支出，也不應當對各教會團體和各宗教團體有任何出自國幣的支出；這些團體應當成爲一種完全自由的、與政權無關的同道者的公民同盟。只有徹底執行這些要求，才能結束那種可恥的和可詛咒的過去：那時的教會會處於對國家的農奴式的依賴地位，而俄羅斯公民則又處於對國家教會的農奴式的依賴地位；那時存在過並使用過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法律（這種法律至今還保存在我們的刑事法典和刑事法規中），這種法律是迫害有信仰者或無信仰者的，違反人的良心的，將官位和國幣跟某種國家教會這種濁酒之分配聯系在一起的。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向現代國家和現代教會提出的要求。

俄國的革命應當實現這種要求，視之爲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組成部分。俄國的革命在

這方面有着特別有利的條件，因為警察——農奴制專制政體的令人討厭的官僚作風，甚至在僧侶中間也引起了不滿、動搖和憤慨。俄國的正教僧侶在過去縱然是受壓迫的，縱然是愚昧的，到了現在，甚至他們也被俄國的舊制度、中世紀制度的崩潰之驚雷喚醒了。甚至他們也感到自由的需要，抗議官僚的作風和官吏的專橫，抗議強加於「上帝的僕人」身上的警察的搜查。我們，社會主義者，應當支持這種運動，使僧侶階級中的正直人士和誠實人士的要求獲得結果，真正地接受他們的關於自由的言論，要求他們堅決斷絕宗教和警察間的任何關係。要麼你們是誠意的，那末你們就應當主張教會與國家、學校與教會完全分離，主張完全地和無條件地宣佈宗教為私人事情。要麼你們就不接受這些徹底的對自由的要求，——那就是說你們依舊被宗教裁判的傳統所俘虜，那就是說你們依舊依賴官位和國帑，那就是說你們不相信你們的武器的精神力量，你們將繼續接受國家政權的賄賂，——那末全俄國的覺悟工人就要向你們宣佈無情的戰爭。

宗教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而言，却不是一件私人事情。我們的黨是覺悟的、先進的戰士為爭取工人階級之解放的同盟。這樣的同盟對宗教信仰方面的不覺悟、蒙昧或反開化，就不能夠也不應當漠不關心。我們要求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為的是用純粹

的思想武器，而且僅僅是思想武器，即用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來跟宗教這種迷霧進行鬥爭。可是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就是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方面也正是爲了這種反對對工人加以任何宗教愚弄的鬥爭。而在我們看來，這種思想鬥爭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

要是如此的話，爲什麼我們在自己的黨綱中不宜佈我們是無神論者呢？爲什麼我們不禁止基督教徒和相信上帝者加入我們的黨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就應當說明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和社會民主黨關於宗教問題提法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區別。

我們的黨綱是完全建立在科學的、而且正是唯物論的世界觀上面的。因之，說明我們的黨綱，就必須包括說明這種宗教迷霧的真正的歷史根源和經濟根源。我們的宣傳也必須包括無神論的宣傳；出版相當的科學書籍，現在應當成爲我們黨的工作部門之一，這種科學書籍至今仍受到農奴制專制政權的嚴禁和迫害。我們現在必須遵從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國社會主義者所作的勸告：翻譯和大量傳播法國十八世紀的啓蒙著作和無神論著作。

可是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因此而落到「出於理性」的、超乎階級鬥爭的、抽象的、唯心論的宗教問題的提法，——即資產階級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所常作的問題提法上去。如果認為在一個以無止境地壓迫和折磨勞動羣衆為基礎的社會裏能用純粹說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見，那就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記宗教之壓迫人類只是社會內部經濟壓迫的產物和反映，那就是資產階級的局限性。要是無產階級自己反對資本主義黑暗勢力的鬥爭沒有啓發無產階級的話，任何小冊子、任何說教都不能啓發無產階級。被壓迫階級為創造地上的樂園而進行的這種真正的革命鬥爭之一致，在我們看來，比無產階級關於天上的樂園的意見之一致更為重要。

我們我們的黨綱中沒有宣佈，而且也不應當宣佈我們的無神論，其故即在於此。我們沒有禁止，而且也不應當禁止那保存着某種舊偏見殘餘的無產者接近我們的黨，其故亦在於此。我們將常常宣傳科學的世界觀，在我們看來，跟任何「基督徒」(Christian)的不徹底性作鬥爭是必要的。可是這絕不是說，必須把宗教問題推到首要地位去，首要地

位決不屬於宗教問題；也不是說，爲了那些很快就失去任何政治意義，很快就被經濟發展進程本身擲到垃圾箱裏去的次要的意見或謬語，必須讓真正的革命鬥爭、經濟鬥爭、政治鬥爭的力量分散起來。

反動的資產階級早已經到處注意了，而我們則在現在才開始注意起來：煽起宗教的仇視，以便將羣衆的注意力轉移到這方面來，而離開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這種經濟和政治問題是在自己的革命鬥爭中切實結合起來的全俄無產階級現在正在謀求解決的。企圖分散無產階級力量的這種反動政策，在今天，主要地表現在黑幫的屠殺猶太人方面，到明天，也許會想出任何更精細的新辦法來的。我們無論如何要用平心靜氣的、持久的、耐心的、不煽起任何次要意見分歧的關於無產階級團結及科學世界觀的宣傳，來抗擊這種反動政策。

革命的無產階級正在努力使宗教對國家而言成爲真正的私人事情。無產階級將在這種清除中世紀黴菌的政治制度的進程中爲消滅經濟的奴役，亦即宗教愚弄人類的真正根源，進行廣泛的、公開的鬥爭。

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現在我們把杜馬代表蘇爾科夫在杜馬討論聖教局預算案時的演說，以及我們杜馬黨團會議上討論這篇演說大綱的發言公佈出來，因為這些言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恰巧是在現時特別迫切的問題。凡與宗教有關的一切所引起的興趣，目前無疑已普及於廣大「社會人士」，且已侵入到那些與工人運動接近的知識階層，以及一部分工人羣衆中間了。社會民主黨當然應該表明自己對於宗教的態度。

社會民主黨的世界觀是完全以科學社會主義爲基礎，即是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再三說過的那樣，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它完全接收了法國十八世紀和德國（十九世紀上半期）費爾巴哈唯物論，即絕對無神論的、堅決反對一切宗教的那個唯物主義的歷史傳統。我們要指出，付印前經馬克思閱讀過的恩格斯所著「反杜林」一書，始終申斥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杜林，說他沒有一貫堅持

唯物主義立場而爲宗教和宗教哲學留下了一些後路。必須指出，恩格斯在他論費爾巴哈的著作中向費爾巴哈提出責備，說他反對宗教不是爲了消滅宗教而是爲了刷新宗教，爲了創造出一種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全部宇宙觀的基石。馬克思主義認爲所有一切現代的宗教和教會，所有一切宗教組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用來捍衛剝削制度和麻醉工人階級的工具。

同時，恩格斯又屢次申斥過那些想作得比社會民主黨人更「左」或更「革命」一點，企圖在工人政黨綱領上規定直接承認無神論，即對宗教宣戰條文的人。一八七四年，恩格斯論到當時亡命倫敦的布朗基派公社社員發表的著名宣言時，認爲他們大聲叫喊對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說這樣宣戰是鼓勵信教興趣而阻礙宗教真正消滅的最好不過的手段。恩格斯認爲布朗基派的罪過，就是他們竟不了解只有工人羣衆階級鬥爭盡量吸引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參加自覺革命社會實踐，才能真正使被壓迫羣衆免除宗教壓迫，

至於主張對宗教宣戰作為工人政黨的政治任務，却不過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空談。所以，恩格斯一八七七年「反杜林」一書中無情指斥哲學家杜林對唯心主義和宗教所作的一切最小的讓步，同時又十分堅決地斥責了杜林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禁止宗教的這一系列革命的思想。這樣向宗教宣戰——恩格斯說道——就是「想要比俾斯麥本人更俾斯麥一點」，即重蹈俾斯麥反教權主義鬥爭的覆轍（所謂「為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麥在一八七〇年用警察高壓手段反對德國天主教黨，即反對所謂「中央」黨的鬥爭）。俾斯麥所進行的這個鬥爭，結果只是鞏固了天主教徒的戰鬥教權主義，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業，因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第一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第一位，使某些工人階層和民主派分子離開革命階級鬥爭的迫切任務而轉向最膚淺的和資產階級騙人的反教權主義方面去了。恩格斯當時痛斥了妄想做一個超革命家的杜林，說他是想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重複俾斯麥的蠢舉，同時恩格斯又要求工人政黨耐心努力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以期使宗教漸漸消亡下去，而不應冒險採用政治手段去打倒宗教。這

● 恩格斯：「亡命者文獻」，第二集，巴黎公社的布朗基主義亡命者綱領。

● 見恩格斯：「反杜林」。

個觀點深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肺腑，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會主張給予耶穌教徒自由，主張允許他們進入德國國境，取消反對這種或那種宗教的一切警察高壓手段。「宣佈宗教爲私人的事情」——「愛爾福特綱領」（一八九一年）中這一句有名的條文，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上述政治策略。

這個策略現在已經成爲一種老生常談而引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種相反的、機會主義的新曲解。有人竟把「愛爾福特綱領」解釋成這樣，彷彿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我們黨，認定宗教是一件私人事情，彷彿在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看來，在我們黨看來，宗教是一件私人事情。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雖沒有同這種機會主義觀點進行過直接的爭辯，但他同時認爲必須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不過不是採用辯論的方式而是採用正面敘述的方式。當時恩格斯用聲明方式特意着重指出，社會民主黨把宗教當作私人事情是對國家而言，絕對不是對社會民主黨本身而言，不是對馬克思主義而言，不是對工人政黨而言。

● 指恩格斯給馬克思書「法蘭西內戰」所作的「序」。

從外表上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宗教問題表示意見的經過就是如此。輕率看待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善於或不願意用心思索的人，覺得這種經過只是表明馬克思主義自相矛盾和動搖不定，認為這是一方面主張「徹底」無神論，另一方面又對宗教表示「優容」的糊塗思想，認為這是一種「無原則的」動搖態度，一方面主張同宗教進行極端革命的戰爭，另一方面又暗地想「遷就」信教的工人，恐怕嚇走他們等等。在無政府主義空談家的作品中，往往可以找到這種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可是，凡能認真看待馬克思主義，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和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經驗的人，都能容易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宗教的策略是十分徹底一貫而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地思考過的；凡是迂儒或愚人認作動搖表現的東西，其實都是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必然得出的直接結論。若以為馬克思主義對宗教所持的似乎「溫和」的態度是出於所謂「策略上的」考慮，即想「不致嚇走」工人等等，那就是一種極端錯誤的想法了。恰巧相反，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路線，也是與它的哲學基礎有不可分離的聯系。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它也像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樣，堅決反對宗教。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

的辯證唯物主義却要比百科全書派和費爾巴哈更進一步，它把唯物主義哲學應用到了歷史領域，應用到了社會科學領域。我們應當同宗教作鬥爭。這是全部唯物主義，亦即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停留在起碼原則上的一種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它認為必須善於同宗教作鬥爭，爲此就要善於用唯物主義觀點來說明羣衆中的信教觀念和宗教的根源。決不能把反宗教鬥爭局限於抽象的思想的說教，決不能把它弄成這樣的說教，而是應該使這一鬥爭同力求把宗教的社會根源剷除的那個階級運動的具體實踐聯繫起來。爲什麼宗教能在落後的城市無產者羣衆中，在廣大的半無產者羣衆以及農民大衆中得到支持呢？是因爲民衆愚昧無知的緣故，——資產階級進步黨人，即激進派或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者這樣回答道。因此，他們認爲主要任務是打倒宗教，擁護無神論，宣傳無神論觀點。馬克思主義者說：這是謊話。這是一種膚淺的、資產階級偏狹的文化主義觀點。這種觀點不够深刻，這不是用唯物主義原則而是用唯心主義原則說明宗教根源。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這種根源主要是社會的根源。勞動羣衆在社會方面備受壓制，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盲目勢力面前，在這些時時刻刻使普通勞動民衆受到比任何一種非常事變，如戰爭地震等等所引起的最大災難和最大苦痛，還要厲害千倍的

盲目勢力面前似乎毫無辦法，——這就是現在最深刻的宗教根源。「神是恐懼心理造成的」。現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對資本盲目勢力的一種恐懼心理，而這種勢力之成爲盲目自發的勢力，就是因爲民衆不能預察到它，它使無產者和小私有主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而且真正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壞，災殃，變成乞丐，變成窮人，變成娼妓，死於飢寒的危險。凡屬不願始終做個幼稚班的唯物主義者的人，就應當首先和特別注意到這種根源。無論什麼教育性質的書籍，都不能把受資本主義苦役制度壓迫，受資本主義盲目破壞勢力擺佈的羣衆所懷的宗教觀念除去，只有當這些羣衆自己已經學會怎樣聯合一致，組織嚴密，有條不紊而且自覺地實行反對這種宗教根源，反對資本統治的一切表現時，才能消除這種宗教觀念。

是不是要由此得出結論，說教育性質的反宗教書籍是一種有害或多餘的東西呢？決不是。由此所應得出的完全不是這樣的結論。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說社會民主黨的無神論宣傳應當服從於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任務，即服從於發展被剝削羣衆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的任務。

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基礎未加深思的人，也許

不能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了解）這個命題。怎會這樣呢？思想宣傳，某種觀念的傳佈，對數千年以來文化和進步的敵人（即宗教）所作的鬥爭，爲什麼要服從於階級鬥爭，即服從於爲了經濟政治方面某種實際目標所進行的鬥爭呢？

這種反對意見是一種最流行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見，提出這種意見就是表明自己完全不懂馬克思辯證法。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所迷惑不解的矛盾乃是實際生活中的實際矛盾，即辯證法的矛盾，而並不是字面上的或是臆造出來的矛盾。誰要是認爲無神論的理論宣傳，即打破某些無產階級羣衆所持宗教觀念的宣傳，與這些羣衆階級鬥爭的成效、進程和條件之間有一種絕對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是用非辯證法的態度考察問題，就是把可能變動的相對的界限看作絕對的界限，就是把具體實際生活中互相聯系而不可分開的東西強迫分開。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說吧。比如說，假定某個地方和某個工業部門的無產階級分爲兩個階層，其中一個階層是頗爲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先進分子，他們當然是些無神論者，另一階層則是還與鄉村及農民相聯結而頗爲落後的工人，他們還相信上帝，常到教堂裏去做禱告，或且甚至直接接受本地某一個——比如說——組織了基督教會的牧師的影響。我們更假定，這個地方的經濟鬥爭引起了罷工。馬克思主義者就應

該把罷工運動的成功放在第一位，應當堅決反抗把參加這個鬥爭的工人劃分為無神論者和基督教徒，應當堅決反對這種劃分。在這樣的情形下，無神論的宣傳就會是一種多餘而且有害的事情，——當然不是從什麼恐怕嚇走落後工人，恐怕在選舉時落選等等的庸俗計較出發，而是從階級鬥爭的真正進步利益出發，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這種鬥爭能把基督教工人吸收到社會民主運動和無神論運動方面來，要比單單作無神論說教好過百倍。在這樣的時候和這樣的環境中宣傳無神論，就無異是幫助本地牧師和一般牧師，因為牧師正是最願意用按信教標準劃分工人的原則來代替按參加罷工標準劃分工人的原則的。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不顧一切地對宗教開戰，實際上就會是幫助牧師和資產階級（正像無政府主義者在實際上常常是幫助資產階級一樣）。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是唯物主義者，即堅決反對宗教的人，但他們應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就是說，他們不應抽象提出反宗教鬥爭的問題，不應根據抽象的，純粹理論上的，始終不變的說教來進行反宗教鬥爭，而應具體提出這個問題，應根據目前實際在進行的和最能教育廣大羣衆的階級鬥爭提出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善於估計全部具體情況，隨時找出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界綫（這種界綫是相對的，可能變動的，但它確實是存在的），既不陷

入無政府主義者所鼓吹的那種抽象的、口頭上的、其實是空洞的「革命主義」立場，也不陷入小資產者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庸俗主義和機會主義立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害怕同宗教作鬥爭，忘記自己的這種任務，容忍信神觀念，他們的出發點不是階級鬥爭的利益，而是不要得罪某某人，不要推開某某人，不要嚇倒某某人的小氣淺薄的計較，是「恕人者，人亦恕之」的聖賢明訓等等。

凡與社會民主黨對宗教態度有關的枝節問題，都應根據上述觀點來解決。例如往往有人問可否讓牧師做社會民主黨黨員，對於這個問題，通常都援引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經驗來給一個無條件肯定的回答。但這種經驗並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學說應用於工人運動的結果，而且是西歐特殊歷史條件所引起的結果，既然俄國沒有這種條件（關於這種條件，我們往下還要說到），所以在這裏作一個無條件的肯定回答，是不正確的。不能在任何條件下都一勞永逸地宣佈說牧師不能做社會民主黨黨員，但是也不能一勞永逸地提出一個相反的規例。如果有某一個牧師願意加入我們黨來參加政治工作，誠懇地執行黨的任務，對黨綱沒有表示反對，那我們就可以把他接收到社會民主黨裏來，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黨綱的精神和基本原則與這位牧師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許始終只是關係

於他一個人的一種個人矛盾，而一個政治團體要用考試方法來檢驗自己的成員所持觀點是否與黨綱相矛盾，却是無法辦到的。但這種情形當然甚至在西歐各國也是種罕見的例外現象，而在俄國却就更是難於想像的了。其次，假定說這位牧師加入社會民主黨之後，竟在這個黨內實行積極宣傳宗教觀點，作為他自己的主要和唯一的工作，那末黨當然毫無疑義應當把他開除出自己的隊伍。我們不僅應當容許，而且應當特別注意吸收所有一切保持信教觀念的工人來加入社會民主黨，我們絕對反對任何一種侮辱其宗教信仰的行為，但我們吸收他們是要根據我們黨綱精神來教育他們，而不是要他們來同黨綱進行極鬥爭。我們容許黨內意見自由，但只是在自由結合原則所容許的相當限度內容許這種自由；我們決不要同積極宣傳黨內多數所排斥的那種觀點的人攜手行進。

另一個例子：是不是在一切條件下都能對聲明「社會主義是我的宗教」或宣傳與這種聲明相當的觀點的社會民主黨人實行一律申斥呢？不！這種聲明確實有離開馬克思主義（亦即離開社會主義）之處，但這種離開的意義和比重是可能因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一個鼓動員或一個在工人羣衆面前說話的人為要說得明白一點，為要用不開通的羣衆覺得最為習常的字眼來更生動地襯託自己的觀點，為要開宗明義而這樣講，是一回

事。而一個作家宣傳「造神主義」或造神派社會主義（例如像我們的盧那察爾斯基一流人那樣），却又是另一回事。在前一場合實行申斥，就會是吹毛求疵，甚至是過分限制鼓動員的自由，限制用「教授方法」感化羣衆的自由，而在後一場合用黨性態度來實行申斥，却是應該並且必需的。所謂「社會主義是宗教」一語對於某些人說是從宗教方面轉到社會主義方面來的一種方式，而對於另一些人說，却又是從社會主義方面轉到宗教方面去的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就要說到歐洲方面引起了用機會主義態度解釋「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這一提綱的那些條件。當然，這裏是有一般原因的影響，這些一般原因引起了一般機會主義思想，即專爲眼前利益而犧牲工人運動根本利益的思想。無產階級政黨要求國家把宗教宣佈爲私人的事情，但他決不認爲同麻醉人民的鴉片煙作鬥爭的問題，同宗教迷信等等作鬥爭的問題，是「私人的事情」。而機會主義者竟把問題曲解成這樣，似乎社會民主黨認爲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除了通常機會主義曲解（對於這種曲解，我們的杜馬黨團在討論關於宗教問題的演說大綱時完全沒有加以說明）而外，還有那特殊的歷史條件引起了現在西歐各國社會

民主黨人對宗教問題持着一種可說是過分漠視的態度。這就是如下兩重條件：第一，反宗教的鬥爭是革命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並且這個任務在西歐各國大半是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他們自己的革命時代，或他們自己對封建制度和中世紀關係舉行攻擊的時代實現了的（或着手實現過的）。在法國和德國都有過資產階級反宗教鬥爭的傳統，這個鬥爭是遠在社會主義運動以前就開始了的（百科全書派，費爾巴哈）。在俄國方面，由於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特殊條件，這個任務也幾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階級肩上。同歐洲比較起來，我國小資產階級（民粹主義）民主派在這方面並不是作得太多（如「路標」●方面初出茅廬的黑幫立憲民主黨人或立憲民主黨黑幫分子所想的那樣），而是未免作得太少。

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反宗教鬥爭的傳統在西歐早已造成了無政府主義對於這一鬥爭所作的特別資產階級性的曲解，這種無政府主義者，如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屢次解釋過那樣，雖然非常「猛烈地」攻擊資產階級，但他們終究是站在資產階級世界觀基礎上的。

●「路標」是以「路標集」得名。「路標集」是於一九〇九年由一羣有名的立憲民主黨作家出版。立憲民主黨人在這個文集代表資產階級感謝沙皇政府擊潰一九〇五年革命，因而表明俄國自由派已完全轉入反革命營壘。

拉丁語系諸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德國的莫斯特（順便說說，他曾是杜林的門徒）及其同流，奧國八十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是把反宗教鬥爭中的革命清談弄到了 *nec plus ultra* 的^①。所以無怪乎現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常因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弄得矯枉過正。這是情有可原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當的，但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若忘記西歐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那就不正確了。

第二，在西歐方面，自從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完結以後，自從施行了多少完備的信教自由以後，反宗教的民主鬥爭問題在歷史上已被資產階級民主派反社會主義運動的鬥爭排擠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了，所以資產階級政府往往故意對教權主義舉行冒充自由主義的「討伐」，藉以誘惑羣衆離開社會主義運動。德國的所謂爲文化鬥爭，以及法國資產階級共和派反對教權主義的鬥爭，都屬於這種性質。資產階級的反教權主義鬥爭，作爲誘惑工人羣衆離開社會主義運動的手段，——這就是現今西歐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漠視」反宗教鬥爭的心理流行的淵源。這也是情有可原，並且是正當的，因爲社會民主黨人正應使反宗

教門爭服從於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藉以對抗資產階級和俾斯麥派的反教權主義運動。

俄國的條件却就完全不同了。無產階級是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成爲反對一切中世紀制度鬥爭的思想領袖，其中也包括反對陳腐官場宗教的鬥爭，以及反對一切想要刷新宗教，重新或用其他某種方式論證宗教等等企圖的鬥爭。因此，如果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把工人政黨要國家宣佈宗教爲私人事情的主張改換成宣佈宗教對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本身說是私人事情的這種機會主義態度，還只受到過恩格斯較爲柔和的糾正，那末俄國機會主義者仿效德國人這種曲解態度，却就會應該受到恩格斯更激烈百倍的指斥了。

我們的黨團在杜馬講台上聲明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原是作得完全正確的，於是它就作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每次對宗教問題發表意見時都應以之爲基礎的先例。是不是還應更進一步，把無神論的論據更詳細發揮一下呢？我們認爲這是用不着的。這樣來作，就會有使無產階級政黨把反宗教鬥爭的意義誇大的危險；這樣來作，就會把資產階級的反宗教鬥爭與社會主義者的反宗教鬥爭間的界限完全抹殺掉。社會民主黨黨團在黑幫杜馬裏所應執行的第一件事情，已是很好地執行了。

第二件事情，——甚至可以說是社會民主黨人最重要的事情，——即說明教會和僧侶幫助黑幫政府及資產階級進行反工人階級鬥爭的階級作用這一任務，也是很好地執行了。當然，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說很多的話，社會民主黨人在今後的言論中還會提出一些補充蘇爾科夫同志演說的意見，但這篇演說畢竟作得很好，而目前我們黨的直接任務就是要全黨各級組織都來廣泛散佈這篇演說詞。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詳盡地說明常被德國機會主義者曲解的所謂「宣佈宗教爲私人事情」這一命題的正確意思。可惜蘇爾科夫同志沒有作過這一點。其所以可惜，更因爲在黨國過去的活動中，對於這個問題已經犯過「無產者報」及時指出了的別洛烏索夫同志所犯的錯誤。黨國中的討論情形表明出，黨國爭論無神論問題的時候，竟忽略了必須把所謂宣佈宗教爲私人事情這一著名要求作個正確說明的問題。我們決不把整個黨國所犯的這個錯誤歸罪於蘇爾科夫同志一人。不僅如此。我們還公開承認這裏有全黨的過失，因爲我們全黨也沒有充分解釋過這個問題，沒有充分使社會民主黨人認識恩格斯對德國機會主義者所作的那種批評的意思。黨國中的討論情形，證明這正是對問題沒有明白認識的結果，而並不是由於不願意顧到馬克思學說的結果，所以我們深信這種錯誤

在黨團今後的發言中是會糾正過來的。

我們再說一遍，一般和大體說來，蘇爾科夫同志的演說作得很好，全黨各級組織都應當把它廣泛傳佈。黨團對於這個演說詞的討論，證明它完全誠懇地執行着它所負的社會民主黨人職責。我們希望時常有記述黨團內部討論情形的通信在黨刊上發表，使得黨團和黨的關係更加密切，使黨能熟悉黨團內部所進行的困難工作，藉以造成全黨與黨團活動方面思想上的一致。

寫於一九〇九年五月

各階級和各政黨對於宗教和教會的態度

在國家杜馬中關於聖教局預算問題的討論，其次關於已經脫離僧侶身分者的復權問題的討論，最後關於舊教徒團體問題的討論，都給了我們格外有教訓意義的材料，可以用來從俄國各政黨對宗教和教會的態度方面說明俄國各政黨的特徵。我們來總觀一下這種材料，主要是來談一談聖教局預算的討論（關於上述其他問題的速記報告，我們尚未收到）。

第一個結論，這是在研究杜馬的討論時特別引人注意的一個結論，就是戰鬥的教權主義在俄國不僅在實際上存在着，而且顯然在日益強大起來和組織起來。四月十六日，米特羅方主教曾聲稱：「我們的杜馬活動的第一步，其方針就是受崇高的人民選舉尊敬的我們，在杜馬這裏要超越各種黨派的分裂，成立一個僧侶團體，這個團體要從自己的倫理觀點來照明各方面……那末我們沒有達到這種理想的境地，是由於什麼原因呢？……其

罪在於和你們」（即立憲民主黨員和「左派」）「同席的人，亦即屬於反對派的僧侶代表們。他們最先提高了自己的嗓子說這和產生教權主義黨沒有兩樣，說這是非常不應當的。當然，俄國正教僧侶的教權主義是不必去談的——因為我們從未有過這一類的傾向，我們願意分開成立一個個別的團體，追求純道德的和純倫理的目的，諸位先生們，現在因為左派代表們給我們同行內部帶來這種不同意見，於是產生了分離和破裂，而現在你們」（即立憲民主黨員）「反在這一點上責備我們」。

米特羅方主教在其無知無識的演詞中洩漏了一個秘密：你們瞧，左派的罪過是在排斥一部分杜馬僧侶成立特殊的「道德的」（這幾個字當然比「教權主義的」幾個字更便於欺騙人民）團體！

差不多一個月後，五月十三日，葉甫洛吉主教在杜馬中誦讀了「杜馬僧侶的決議」：「正教的杜馬僧侶絕大多數認為」……爲了「正教教會的頭等的和優勢的地位」，不容許舊教徒有說教自由，不容許舊教徒有成立團體的申請手續，不容許舊教僧侶有祭司的名稱。俄國僧侶的「純道德觀點」充分暴露了本身就是最純粹的教權主義。杜馬僧侶的「絕大多數」（葉甫洛吉主教曾用這種名義說話）大概是第三屆杜馬中二十九名右派和溫和右

派的祭司，也許還有八名十月黨的祭司。站到反對派去的，該是四名進步黨與和平復興黨的祭司，一名波蘭——立陶宛黨人。

那末「絕大多數杜馬（必須添上：六三政變的）僧侶的純道德觀點、純倫理觀點」是怎樣的呢？這就是一些演詞摘要：「我只是說，這些（即教會的）改革的提案應當從教會內部產生，不應當從教會外面產生，不應當從國家方面，當然也不應當從預算委員會方面產生。要知教會是一種神聖的和永恆的機關；它的法則是一定不易的，而國家生活的理想，如所周知，則是經常變化的」（葉甫洛吉主教語，四月十四日發言）。這位演說家想起「歷史上令人不安的類似的事情」；葉加特琳二世時代沒收教會的財產。「誰能保證預算委員會，它在本年會表示過願意把它們（教會財產）隸屬於國家管理之下，到明年不會表示願意把它們移到全國的國庫，而到後來又完全把它們從教權手中轉交給民權或政權去管理呢？……教會法規說，如果基督教徒信託主教，那末教會財產就更應信託主教……現在站在你們（杜馬代表們）面前的是你們的精神之母，神聖的正教教會，她不僅僅像站在人民代表的面前一樣，而且像站在自己的精神之子面前一樣」（同前）。

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種純粹的教權主義。教會高於國家，正如永恆的和神聖的高於

暫時的和俗世的一樣。教會並沒有寬容國家沒收教會的財產。教會反要求取得頭等的和優勢的地位。在教會看來，杜馬代表不僅是——更正確地說，與其說是——人民代表，還不如說是「精神之子」。

這正如社會民主黨員蘇爾科夫所說的，不是穿法衣的官吏，而是穿法衣的農奴制擁護者。保護教會的封建特權，公開主張中世紀的制度——這就是大多數第三屆杜馬僧侶的政策的本質。葉甫洛吉主教決不是一個例外。葛彼茨基也大聲疾呼反對「沒收」，視「沒收」為不能容忍的「侮辱」（四月十四日發言）。僧侶馬什基維契痛責十月黨人的報告，說它企圖「破壞我們的教會生活所憑依的和應當憑依的那種歷史的和宗規的基礎」，「把俄國正教教會的生活和活動從宗規的道路上移到那種道路上；在那種道路上……真正的教會公爵——主教——應把繼承自使徒的幾乎全部的權利讓給俗世的公爵」……「這無非是……侵害別人的財產，侵害教會的權利，侵害教會的財產」。「報告者引我們去破壞教會生活中的宗規制度，他想把正教教會及其一切經濟機能隸屬於國家杜馬，隸屬於那種由最複雜的分子和我們國內已被寬容和未被寬容的宗教組成的機關」（四月十四日發言）。

俄國的民粹派分子和自由主義者久已自慰於，或更正確地說，自欺於一種「理論」，

說在俄國沒有戰鬥的教權主義的基礎，沒有「教會公符」跟俗世政權鬥爭的基礎等等。跟民粹派分子的和自由主義者的其他幻想一道，我們的革命把這種幻想也澄清了。當專制政治完整地 and 神聖不可侵犯地存在的時候，教權主義是在隱蔽的形式中。警察和官僚的全能，常常在「社會」和人民的前面遮掩了一般的階級鬥爭，特別是「穿法衣的農奴制擁護者」跟「微賤的老百姓」的鬥爭。一當農奴制擁護者的專制政治被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農民擊破第一個缺口，就使秘密的變成公然的了。無產階級和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在一九〇五年末獲取了自由之後，剛剛開始享有政治自由和組織羣衆的自由的時候，反動階級就轉向獨立的和公開的組織了。他們在完全的專制政治時代之所以沒有組織起來，沒有特別明顯地出現，並不是因為他們弱而是因為他們強，不是因為他們不能組織和不能作政治鬥爭而是因為他們在那時對於獨立的階級組織還沒有感到十分的必要。他們不相信反對專制政治和農奴制擁護者的羣衆運動在俄國有其可能性。他們完全信賴這一點：要控制老百姓，鞭子就足够了。專制政治所受的最初的創傷迫得擁護專制政治和需要專制政治的社會分子挺身而出。要對付那種能夠創造一月九日、一九〇五年罷工運動和十月—十二月革命的羣衆，單用舊的鞭子已經無濟於事了。需要走上獨立政治組

織的活動舞台，需要「統一貴族會議」組織黑幫，並展開肆無忌憚的盡感宣傳；需要「教會公爵——主教」把反動僧侶組織成獨立的力量。

俄國反革命的第三屆杜馬和第三屆杜馬時期的特點，恰恰就是這種反動勢力的組織出現了，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需要特殊的黑幫資產階級的「國會」了。戰鬥的教權主義明顯地出場了，而俄國社會民主黨現在經常有機會成爲教權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反教權主義的資產階級間衝突的觀察者和參加者。如果我們的總任務是在幫助無產階級團結成爲一個善於把自己跟資產階級民主分別開來的特殊階級的話，那末就得把利用各種宣傳和鼓動方法，包括利用杜馬講壇在內，來向羣衆解釋社會主義反教權主義跟資產階級反教權主義的區別這一點，作爲這個總任務的一部分。

在第三屆杜馬中反對極端右派、反對教權主義者和反對政府的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明白地表明了資產階級對教會和宗教的態度，使得我們的這一個任務變得容易多了。立憲民主黨和所謂進步黨的合法刊物現在正在特別注意舊教徒的問題，注意十月黨人跟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反對政府的這一事實，注意他們雖然是小規模的，但「已在開始」十月十七日所允諾的「改革」的這一事實。使我們更有興趣的是問題的根本方面，亦即

一般的資產階級，直至冒稱民主黨員的立憲民主黨員爲止，對宗教和教會的態度。我們不應容許那比較是枝節的問題——關於舊教徒跟勢力最大的教會的衝突問題，關於與舊教徒有關的、和部分地甚至正是在財政方面依賴舊教徒的十月黨人（據說「莫斯科之聲」●就是用舊教徒的錢出版的）的行爲問題——來遮掩資產階級這一階級的利益和政策的根本問題。

請看一下伍伐羅夫伯爵的演詞吧，按照他的傾向說，他是退出十月黨團的十月黨人。他在社會民主黨員蘇爾科夫之後發言的時候，立刻拒絕把問題提到工人代表會把它提到過的那種原則的基礎上。伍伐羅夫僅僅攻擊聖教局和檢察總長，因爲他們不願向杜馬報告某項教會收入和教區用款。十月黨的正式代表卡明斯基提出同樣的問題（四月十六日發言），他是要求「爲鞏固正教的利益」而恢復教區的。所謂「左派十月黨人」卡普斯丁也在發揮這種思想，他喊道：「如果我們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農村居民的生活，那末我們現在立刻就看到一種悲慘的現象——宗教的生活在動搖着，人民道德制度的最

●「莫斯科之聲」是日報，十月黨——大工業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黨——的機關報，自一九〇六年起至一九一五年止在莫斯科出版。

偉大的唯一的基礎在動搖着……用什麼來代替罪惡的觀念？用什麼來代替良心的指示？要知用階級鬥爭和某一階級的權利來代替，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悲慘的觀念，這種觀念已踏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因之，爲了使作爲道德基礎的宗教能繼續存在，爲了使它能接近全體人民，由這種觀點看來，就需要這種宗教的傳導者享有相當的威信」……

反革命資產階級的代表想鞏固宗教，想鞏固宗教對羣衆的影響，同時又感到正在降低教會威信的「穿法衣的官吏」所帶給統治階級的是不中用、是不合時宜、甚至是禍害。十月黨人爲了加強宗教對羣衆的影響，爲了用更精細的、完善的愚民方法來代替至少是某些太粗笨的、太陳腐的、太老朽而難達目的的愚民方法，就反對極端的教權主義和警察的監視。警察式的宗教已經不足以用來愚弄羣衆了，請給我們更文雅的、更新式的、更靈活的、更能在自治教區起作用的宗教吧，——這就是資本向專制政治所要求的。

立憲民主黨員卡拉伍洛夫也完全站在同一個觀點上。這位「自由主義的」叛徒（從「民意派」進化到右派立憲民主黨員的叛徒）大聲疾呼反對「廢止教會國有化，所謂廢止教會國有化，其意就是把人民大眾、俗衆逐出建教事業」。他認爲羣衆「沒有信仰」是「可怖的」（簡直是如此！）。他完全孟希柯夫式地喊道：「教會的巨大的本身價值在低

落……這不僅對教會事業有大害，而且對國家事業有大害」。他把宗教狂熱者葉甫洛吉論述「教會的任務是永恆的、一定不易的，也就是說教會跟政治結合是不可能的」這種令人討厭的偽善，稱之爲「金言」。他爲了教會「用比現在更大的力量和光榮來完成基督精神——愛和自由方面的偉大的、神聖的事業」這件事而抗議教會跟黑幫聯合。

畢洛伍索夫同志從杜馬講壇上嘲笑卡拉伍洛夫的這些「抒情字句」，嘲笑得非常之好。但這樣的嘲笑還很不够。必須闡明，——將來必須一有適當的機會就從杜馬講壇上闡明，——立憲民主黨的觀點跟十月黨的觀點是完全相同的，它說的無非希望「文雅的」資本用那種比從前普通的俄羅斯「神父」所實踐過的更爲精細的教會欺騙方法的宗教麻醉劑來愚弄人民。

野蠻的地主和老警察借着普里什吉維契的口吻說：爲了使人民陷於精神奴役狀態中，就須要教會和黑幫作最緊密的聯合。反革命的資產者借着卡拉伍洛夫的口吻反對他們道：諸位先生，你們錯了，你們用這種方法只是把人民完全排擠出宗教之外。請做得更聰明些、更狡猾些、更巧妙些吧，——讓我們拋棄掉太愚蠢、太粗暴的黑幫吧，讓我們宣佈反對「廢止教會國有化」吧，讓我們在旗幟上寫下葉甫洛吉主教的「金言」吧；教

會高於政治，——只有用這樣的行動方法，我們才能愚弄至少是一部分的落後工人，特別是小市民和農民，我們才能幫助已經復興的教會執行它的使人民大眾陷於精神奴役狀態的「偉大的、神聖的事業」。

我們的自由主義的刊物，一直到「言論報」為止，在最近猛烈地斥責司徒盧威及其伙伴，「路標」文集的撰稿者。但立憲民主黨在國家杜馬中的正式演說者卡拉伍洛夫絕妙地暴露了這些斥責和這種拒絕司徒盧威及其伙伴的無恥的偽善。司徒盧威在嘴上說的，也就是卡拉伍洛夫和米留可夫在心上想的。自由主義者之斥責司徒盧威，只是爲了他粗心地洩漏了真情，爲了他攤牌攤得太早。斥責「路標」而又繼續擁護立憲民主黨的自由黨人們用最無恥的手段欺騙人民：一邊斥責粗心地洩漏了的話語，一邊又繼續幹那正與這種話語相符的事情。

關於杜馬中勞動黨員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所表現的行爲，只須稍微講一講。像通常一樣，農民勞動黨員與知識分子勞動黨員之間的顯明的差別，對後者不利地暴露出來了，因爲後者對於追隨立憲民主黨，具有更大的決心。誠然農民羅什科夫已由自己的演詞暴露了自己全部的政治上的不自覺；他也重複了立憲民主黨人關於「俄羅斯人民同盟」無補

於信仰的鞏固，反而有助於信仰的破壞這種庸俗思想，他不能說明任何綱領。但相反，當他老老實實地開始述說赤裸裸的、沒有粉飾的真相：關於僧侶階級的苛捐，關於僧侶個人的勒索，關於爲了結婚，除了金錢之外，還怎樣要求「一瓶燒酒、一道冷盤、一磅茶葉，有時又要求那種我在講壇上所怕說的事情」（四月十六日發言，速記報告第二二五九頁）的時候，——黑幫杜馬聽不下去了，就從右邊的座位上發出了野蠻的咆哮。「幹什麼嘲弄？幹什麼無禮？」——黑幫派大聲疾呼了，因爲感到關於苛捐的普通的農民演詞和聖禮的「法定價格」的敘述，比任何理論上的和策略上的反宗教和反教會的宣言更會使羣衆革命化。接着第三屆杜馬中堅持專制政治的死硬派嚇住了自己的小廝，主席梅因道爾夫，強迫他制止羅什科夫發言（社會民主黨人，還有某些勞動黨人、立憲民主黨人以及其他黨人也與之聯合一起，提出了抗議，反對主席的這種行爲）。

農民勞動黨員羅什科夫的演詞，雖然是非常幼稚的，但是它極好地表明了立憲民主黨人的偽善的、蓄意反動的宗教防衛，和農民的原始性的、不自覺的、陳腐的宗教心之間，有着一條鴻溝。在農民身上，他的生活條件——反乎他的意志、超乎他的自覺地——正產生着反對苛捐的真正革命憤恨和堅決反對中世紀制度的決心。立憲民主黨員們是反

革命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想復興和鞏固反人民的宗教。羅什科夫之流則是革命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表；這種民主是未發展的、不自覺的、被壓制的、不獨立的、零散的，但在跟地主、跟僧侶、跟專制制度鬥爭中，却蘊藏着遠遠未發揮盡的革命動力。

知識分子勞動黨員羅扎諾夫之接近立憲民主黨，却不是像羅什科夫那麼不自覺的。羅扎諾夫能够述說教會與國家分離這一「左派」要求，但他禁不住說出反動的、小市民的空話：「要這樣來修改選舉法，以使僧侶階級不參加政治鬥爭」。一個典型的、普通的農民，當開始述說其生計的真相時自然流露出來的革命性，在一個知識分子勞動黨員的身上是找不到的，而被一種誇誇其談的、有時簡直是令人討厭的空話所代替。我們千百次地看到這種真理的明證：就是俄國的農民大眾只有跟着無產階級走的時候，才能推翻地主農奴制擁護者、穿法衣的農奴制擁護者、農奴制專制政治擁護者壓潰他們和損害他們的壓迫。

工人政黨和工人階級的代表、社會民主黨人蘇爾科夫，全杜馬中只有他一位把討論提到了真正原則性的高度，並老實地述說了無產階級怎樣對待教會與宗教，整個徹底的

和有生命力的民主黨應該怎樣對待教會與宗教。「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一文人民的錢都不給這種迷糊人民意識的血腥的人民敵人」，——社會主義者的這種直截的、大膽的、公開的戰鬥呼聲正如對黑幫杜馬的挑戰，獲得了千百萬無產者的響應。無產者把這種呼聲在羣衆中傳佈開來，時候一到，羣衆就把它變成革命的行動。

一九〇九年六月四日（公曆六月十七日）